

父亲袁国平抗日前线浴血杀敌

袁振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的父亲袁国平为了这一伟大胜利，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奉献了他的全部智慧、全部精力以及他所能奉献的一切，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眼看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正在延安治病的父亲心急如焚，急切地要到抗日前线杀敌。他在给我堂兄袁振鹏的信中说：“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去抗日前线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解放和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

1939年，袁国平在江南视察
场，死而无憾。”

父亲由延安到新四军就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给我祖母刘冬秀的信中说：“儿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母亲的光

荣。敌人正张牙舞爪，想吞噬全中国，我们要斩断敌人的爪牙，为一切死难的同胞复仇。解放上海、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表达了他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和亲临前线杀敌的雄心壮志。

父亲一到皖南就积极协助叶挺、项英完成了新四军的编组，挺进敌后，战略展开，确定战略支点，建立根据地，制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发展新四军。他在积极创建新四军、努力开拓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同时，还亲临抗日最前线指挥作战，浴血杀敌。从 1938 年到 1940 年的三年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 2742 次，歼灭日伪军 55220 人，仅在皖南地区作战就有数百次之多。我父亲总是身先士卒，战斗在最前线。无论是繁昌保卫战、云岭保卫战，还是在泾县、南陵、繁昌、宣城等各地历次反“扫荡”的战斗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其中 1940 年秋季皖南反“扫荡”就是一例。

1940 年 10 月，日军为维护长江交通运输，掠夺秋粮，配合其对重庆等地国民政府大后方的进攻，调集万余兵力（其中伪军 3000 余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诸兵种联合作战，再次大举“扫荡”皖南。新四军皖南部队当时兵力共约 7000 余人。叶挺、项英决心采用游击战术进行机动防御，消耗、疲惫日军，利用有利地形实施伏击，以达歼敌一部，配合这一地区的友军作战，由第三支队率第五团在铜陵、繁昌一带打击日军，其余部队在繁昌、南陵、泾县地区与敌周旋，以粉碎敌人的“扫荡”。为加强对第三支队的领导，父亲袁国平亲自前往第三支队。

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已在苏北对我新四军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遭到新四军自卫反击受挫后，就着手策划袭击势孤力单的皖南新四军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大敌当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以大局为重，在蒋介石不发弹药、克扣军饷的困难情况下，仍然投入反“扫荡”作战。时

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的林植夫回忆说：“第三战区从二十九年（民国）四月起至皖南事变止，没有发一颗子弹，还欠我们不少饷，这是有案可稽的。据我所知，叶军长亲自向顾祝同交涉了 20 万发子弹，直至皖南事变止，派许多人去领，始终领不到手，但是打泾县那一仗，新四军还尽了全力，我们真是对得住国家和民族了，那一役，我恰在场。”

父亲到达第五团即召集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部主任胡荣及林植夫等开会，研究反“扫荡”方案。会开到一半，即得到情报，日伪军已开始大举进攻，第三支队司令部也是敌进攻的目标之一。父亲简短地布置任务后，会议便告结束，准备作战。

半夜时分，胡荣向父亲报告：“敌人已离我不远。”袁国平、张正坤、胡荣立即赶往政治部背后的张家大山。摸到半山腰一看，离第三支队司令部宿营地不远，日伪军闪闪的火光已清晰可见。紧接着，敌人便开始对我司令部进行炮击。父亲则继续迅速率领大家上山，天亮前赶到山顶，隐蔽待敌。

此时，第三支队已放弃一河之隔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宿营地，全部退守张家大山，以一个连的兵力扼守半山腰。日伪军到司令部驻地扑了个空，又过桥杀到政治部驻地，仍一无所获，便向张家大山进攻。袁国平命令部队坚决还击，日伪军进攻受阻后，改用炮击继续向我进攻。待日伪军爬到新四军阵地前沿时，被我军用机枪、手榴弹杀了回去，双方相持不下。第三支队指挥所设在张家大山背后山凹里一片竹林中，父亲与张正坤、胡荣均在指挥所。他察看了周围的地形，要张正坤留一个学兵连在指挥所附近作预备队。清晨，张家大山下战斗激烈，日军 3 架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指挥所。父亲沉着指挥，要求大家注意隐蔽，对敌机不要理睬。

战斗一直持续到午间，忽然国民党川军派一个副官来与袁国平联络，请求新四军与他们联合打击日伪军。父亲听罢这名副官的报告，知道川军也遭到日伪军的袭击。他还从张正坤处得知，我新四军有一个连队正驻扎在川军附近，当即指示张正坤派一个参谋与川军保持联络，并命令这个连队配合川军作战。联络员走后，袁国平与张正坤、胡荣研究决定，调一个营趁黑夜抄袭日军后方，并由他们直接指挥。

张正坤按照我父亲的指示，向部队下达命令。恰在这时，一颗炮弹打到山顶，“此炮是名符其实的过山炮，威力相当大，所幸打得不准，炮弹爆炸的地方离指挥所很远”。但到了午后，日军的飞机又来投弹，父亲看见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之后，正向指挥所俯冲，顿时感到不妙，立即命令大家卧倒，“好险，一枚炸弹差一点炸中指挥所。”

离指挥所不远的学兵连有两人负重伤，一个被炸断一条腿，另一个腹部被炸伤，露出了肠子，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

日军飞机飞走后，父亲就带领大家翻下张家大山。到了山脚，天色已黑，但月色明亮如昼，不影响作战行动。他见部队已经到位，还多出一连的民众抗日武装，非常高兴。一了解情况，才知道这些民众抗日武装听到消息，就要求与新四军一起打击日军，他们是主动加入的。

父亲率队离开张家大山，穿过三条山冲，忽然在龙潭萧遭遇日军的伏击。“又是一次险情！日军原打算翻过水龙山后，再包抄张家大山，从第三支队指挥所的背后摸上去。”幸亏父亲已率领我军先行一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情况紧急，父亲立即决定分路突围。听到枪声后，遂命令第三支队敌工科段君作向导，向附近的第三团团部驻地清水塘靠拢，突破了日军“围剿”并甩开其尾随追踪，突围成功。

林植夫后来撰文回忆：“袁国平所带的卫士排，经这场遭遇战，

只剩下不到十条枪，其他部队也受到一些损失。”第三支队与日军游击周旋或伺机突袭，并在铜陵东北下河镇等地展开激战，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日伪军遭到重创后被迫回撤。

在云岭方向日伪军约 5000 人在飞机掩护下直扑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距云岭 8 公里的汀潭，是日军进犯云岭的必经之地。在汀潭驻防的是国民党中央军 52 师，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他们故意制造磨擦，多次挤占新四军地盘。此次日军一来，他们一枪未放、拔腿就跑，致使汀潭失守，为日军南下进击新四军，大开方便之门，显然有借刀杀人之嫌。此时，军长叶挺迅速派部队将日军诱至汀潭的左坑地区，将其歼灭千余后夺回汀潭，有效地阻击迟滞了敌人。日军受阻后便转头向东，扑向泾县县城，驻守县城的国民党中央军 52 师又是不战而退，又把泾县县城拱手让给了日军。叶挺军长亲自率领部队夺回了泾县县城。父亲袁国平在繁昌、铜陵地区指挥第三支队击退日



1939 年，袁国平与叶挺于云岭合影

军后就回到军部参与指挥了该方向的作战，经受了 40 余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

此次皖南反“扫荡”作战历时 7 天，共歼灭日伪军近 3000 人，粉碎了日伪军“扫荡”皖南的罪恶企图。

战后的 10 月 18 日，父亲在致我伯父袁醉如的信中写到：“苏南情况如常，皖南今年四月与十月，敌人曾以流窜式的‘扫荡’战术，向我大举进攻两次，第一次打至距军部十五里之处，被我要击于父子岭，将其全部击溃，斩获甚众，十月敌以三个联队向泾南繁宣地域‘扫荡’，基本队伍 9 千多，被我诱至于汀潭（距军部仅数里）左坑地域聚歼千余，激战两昼夜，击溃，向泾县穷追百余里，三捷收复泾县，为东战场猛打猛攻猛追之空前的胜利战役，曾获广大人民之拥护。众誉军部驻地为‘铁打的云岭’。经过三年多抗战的锻炼，我们军队是日益坚强了。”

10 月 25 日，他再次给袁醉如写信，谈到此次反“扫荡”作战：“本月初敌扫荡皖南，逼近军部，经三日之血战，将敌大部击溃，穷追百里之外，三捷收复泾县，使敌人遭受重大之痛创。我军亦伤亡数百，弟亦亲临最前线。在敌机四十架狂炸之下，幸托庇安全无恙。”

然而两个月后，父亲在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皖南事变中身中四弹，重伤难行。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不连累战友，他为部下、为战士英勇自尽，实践了他“如果有 100 发子弹，要用 99 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袁国平和所有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

（写于 2015 年）

袁国平简历

袁国平（1906—1941）湖南邵东人。黄埔军校四期学员，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左翼队第四队队长参加北伐。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南昌起义。11月至12月，以广东省委联络员身份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主持改编起义军余部并创建红四师，任参谋长、党代表、党委书记，率部开展海陆丰地区斗争。1928年11月，任湘鄂赣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和红五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2月当选红四、五、六军前敌委员会委员，进入红军领导核心；6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参与第一次打长沙战役的指挥，创办《红军日报》，扩大红军使红三军团人数扩大一倍。8月中旬代表红三军团前委，会见朱德、毛泽东，建议红一、红三军团合编并由朱德、毛泽东统一指挥，促成红一方面军的诞生。

1930年冬起，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历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等。参与主持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获二等红星奖章，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西北红军大学政委，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三科政委，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政委，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

1938年3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赞誉“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继承红军优良传统，开创新四军政治工作：两次主

持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参与主持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作《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确保了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主持制定《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促使政治工作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积极参与军分会和东南分局的领导，为新四军的壮大、东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1941年1月15日，皖南事变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5岁。

袁国平与新四军军歌

袁振威



当我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陈毅伯伯曾对我说：“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①

1939年2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在袁国平主持的欢迎会上音乐家何士德唱了一首《八百壮士歌》，陈毅用法语唱了一首《马赛曲》，会场的气氛热烈激昂。陈毅感慨地说“我们也应该有一首自己的军歌”。^②当时在场的新四军老战士童树民曾对我说，“其实很多人都有同感。”

其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制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③的战略方针，大家都非常兴奋。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让全军将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与会者异口同声表示赞成。项英当即表示：

① 1965年2月3日陈毅于中南海家中与笔者谈话。

② 何士德《唱军歌振军威战日寇》，《大江南北》杂志1985年第2期。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叶军长的意见很好，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验。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方面军总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围剿时，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在行军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战斗力大大增强。所以创作军歌的工作很迫切，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前方忙于作战，我们军部又人才济济，就在军部范围内征集军歌词然后配曲。现在大家都很忙，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责，军歌的创作由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国平写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接着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我们军队在北伐、反围剿、三年游击战争和万里长征等各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战争环境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军歌要像宣言书一样将我军的宗旨昭示于天下，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及盟国盟军都知道。同时在军歌中要让全军指战员了解我军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第三，军歌应成为激发我军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的有力武器。只有这样，才是一首好的军歌，才能成为革命歌曲中的精品”。最后，袁国平说：“叶军长提出创作新四军军歌对加强我军自身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完全拥护。我深感军歌是最好的教科书，正如二位军长所说创作军歌的任务是政治部份内的事，我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我过去也创作过一些歌词，但要写出这样带有历史文献性重大题材的军歌词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艰巨的任务，我将在尽力抓好军歌创作组织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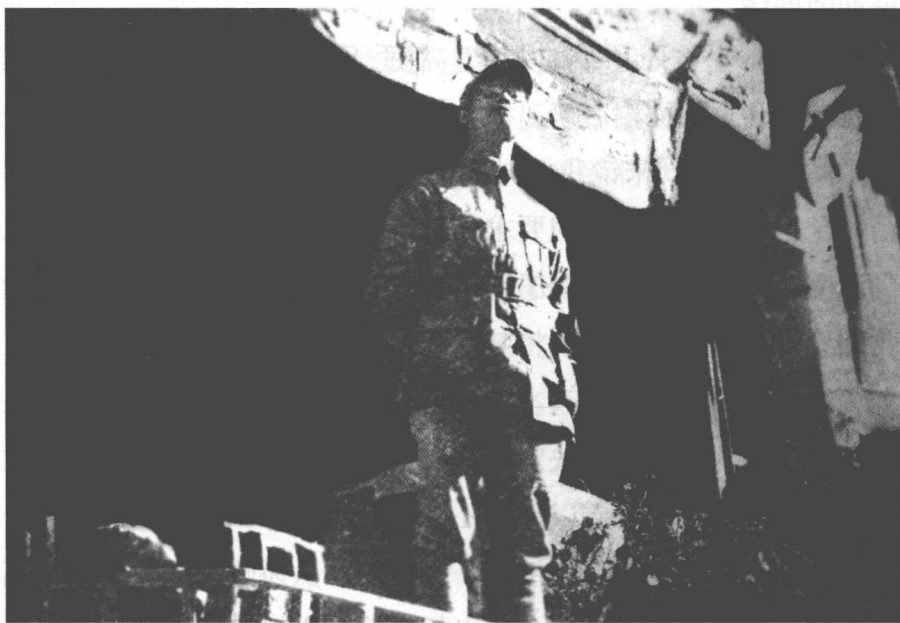
歌歌词的创作”。^①

父亲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着手开展歌词征集，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袁国平、朱克靖等就分别写出了歌词初稿，^②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陈毅回到江南以后于三月底完成了叙事诗《十年》的撰写，四月上旬袁国平收到稿子后即责成朱镜我将其改成歌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黄诚、马宁以外，还有周子昆、李一氓、朱克靖等。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而且更加简洁、精炼。大家都建议即将其交何士德谱曲，同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袁国平同意大家的意见并建议将歌词的第二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改用《十年》中的“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陈毅收到歌词以后，在给政治部的信则认为歌词很好，完全符合他的意思，表示赞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袁国平采纳了陈毅的意见。^③20 多年后陈毅伯伯曾风趣地对我说：“我对新四军军歌的贡献就是一句话、两个字”。

① 文中上述主要内容根据袁国平夫人邱一涵与其侄袁振中谈话记录整理。

② 《湖南省邵阳市文史资料》第1辑。

③ 此为20世纪50年代马宁对邱一涵所言，笔者在场。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在有关新四军军歌的文章中表述。



1939年，袁国平在新四军军部（云岭陈家祠堂）演讲

我父亲在与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朱克靖、马宁等同志一起集体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搞好曲谱。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①他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②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在1939年7月1日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和参加听

① 鲁冰、林晖、童树民：《历史不能杜撰》，《云岭》39、40期合刊，第84页。

② 同上。

的其他同志一致认为符合要求。“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军部在会上郑重宣布：批准通过。”^①并“当即宣布歌名定为《新四军军歌》”。^②新四军军歌确定下来以后，以署名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抗敌》杂志1939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根据袁国平的意见，在同期《抗敌》杂志上也同时发表了陈毅的叙事诗《十年》^③。其后数十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新四军军歌多以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或作曲转载在诸多刊物上（如1948年出版的《中国名歌选》，195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1961年出版《革命歌曲选》见附六），传唱中华大地，至今经久不衰。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道：“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④当年在皖南采访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指战员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在听了袁国平的介绍后，称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文，传到了国外。新中国诞生不久，史沫特莱在奔赴北京途经英国时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托朋友将她的歌词手稿等遗物一起寄给了她曾采访过的朱德总司令（见附五）。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一文中就袁国平对新四军军歌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他积极组织《新四军军歌》的创作，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加强了战斗气势，使之成为一首雄壮有力、脍炙人口的著名军歌。”^⑤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

① 晓风：《新四军军歌是这样诞生的》（王震之整理），《温州都市报》2005年5月24日。

② 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总政直属工作部和光明日报军事部合办网站 www.gmw.cn2008-03-27。

③ 见附四。

④ 鲁冰、林晖、童树民：《历史不能杜撰》，《云岭》39、40期合刊，第84页。

⑤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2010年11月30日。

《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承接了录制唱片的光荣任务，并在开国大典前赶制了编号为：“大中华唱片厂 38254”的唱片，并运达北京。其一面为《国歌》，一面为《新四军军歌》，这张唱片一共制作了 10 张。由此可以看出《新四军军歌》在当代革命歌曲中的重要地位。^①

如今，父亲袁国平和他的战友们精心创作的这首《新四军军歌》曾鼓舞了几代人顽强奋进。每当歌声响起，我都仿佛看到革命先辈们围坐在简陋木桌旁，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沉默凝思……这气势磅礴的雄伟战歌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产生于一群信念坚定、才华横溢的中华精英；他们人已离去，歌声却始终响彻在祖国大地，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代代相传！

值此新四军诞生 75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所有参与新四军军歌创作的革命前辈，借以表达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2012 年 8 月 25 日于南京）

（2015 年 10 月 28 日修改于南京）

附一

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

三期战争获全胜，胜利原因要记清，

第一莫忘共产党，共产党主张样样灵。

第二红军团结紧，十人团结胜千人。

第三群众力量大，群众拥护一定胜。

学此经验和教训，不愁百战不百胜。

^① 见附七。

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斗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地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地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附三：

十 年

1939年3月30日

陈 毅

光荣北伐的行列中，
曾记着我们的威名。
我们继承着革命者受难的精神，
在南国的罗霄山，
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
这里有革命的反帝的歌声烂漫，
飘扬海外，散播农村。
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
招引那民族再团结，
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

风雪饥寒，穷山野营，
磨炼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年隔绝，四围孤立，
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
长年累月的埋伏与周旋，
把游击战争与秘密工作结合在一起。
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
我们就是这个母亲的孩子，
我们铁的纪律就来源于此。